Co-China 周刊

NO. 179
2014年 11月14日

纽约时报upshot：出生年代是如何影响政治观点的？｜练乙铮：香港的「占中」一代｜陈韬文、李立峰：占领运动新组织形态初探

抗命世代的时代



编者的话

上周，香港大学法学教授陈弘毅给学生写了一封信。这位1970年代末在港大读书的教授希望学生停止占领运动，他认为香港现有的成就不应该遭受运动破坏，并直言“香港能有今天的成就，正是因为港人——包括各位同学的父母以至他们的上一代——是理性和务实的，他们接受那些不能改变的政治现实，并在他们所能够享有的有限空间中默默耕耘，胼手砥足，创造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奇迹，于是这颗东方之珠便应运而生。”

很快，他的学生李知乐回应了这封信，讲述了占领多日的所思所想。在回信最后，他落笔：“正因为香港的未来属于我们，我们才不忍看着她沉沦。我们不希望他朝回首时香港已变得满目疮痍。路是人走出来的。我们年轻，我们得撑下去。”

老师与学生的书信对话背后是两代人的价值差异。民调数据从更宏观的视角揭示，香港年轻人对占领运动的支持率远远超过中老年人。事实上，不同世代的争议正是观察此次占领运动的一个重要角度，亦被认为是导致此次运动爆发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港大教授吕大乐在《四代香港人》中深入不同世代的历史体验与生活阅历，归纳出二战之后的四代香港人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他如此概括香港四代之间的关係：“表面上，世代之间相安无事。其实，世代之争即将爆发。安分的第一代人陆续退下舞台，已经开始长出银发的‘战后婴儿’（第二代人）反而毫无倦意，继续指指点点。内地、台湾的三十世代意气风发，香港的（第三代人）却感到出头无期，生活艰难。至于第四代人，他们打从开始便是输家。”

不同世代之间的经历、价值观差异引出了“世代政治”这个重要的命题。美国民主党资讯分析机构Catalist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共同研究发现，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经历的重大事件，常常会影响其一生的政治立场。反观香港当下，这项研究刚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对此运动持保留意见的上一代香港人。另一方面，仍在街头抗争的这一代香港青年更值得我们关注，他们最具塑形效应的青春年华在运动现场中度过，而这绝不是单一的事件，他们成长的背景，他们面临的困境，都一步一步引至他们当下的选择和决心，正如专栏作者练乙铮所言：“当‘占中’运动最终结束——无论是被迫还是自决——且活动领袖兑现服从逮捕的承诺时，亲民主的一代香港人将崛起：他们年轻，有活力，无所畏惧，不屈不挠。这将是北京的政治财阀及其在香港的使者难以应对的一支力量。政治领域将从此改变。”

目录

【1】

陈弘毅：写给在今学期在港大上我的课的学生

陈弘毅：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

各位同学：

我在 1984 年开始任教于港大法律系，《中英联合声明》便是在那时签署的，从那时开始至今，“一国两制”都是我的研究课题。到了今天，我感觉到“一国两制”的实践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一国两制”的路好像变得越来越窄，越来越难行。今天，我离港大的退休年龄已经不远，但你们还年轻，所以这封“香港家书”是写给你们的，我想谈的“一国两制”的前途是否光明，我希望坦诚地、毫无保留的与你们分享我对于“一国两制”的前途的看法，尤其是要指出，除非广大香港市民，包括青年人，都对“一国两制”的政治和法律现实有充分的理解，并以一种理性、务实的态度面对这个政治现实，否则“一国两制”的内部矛盾将会与日俱增，香港社会的内部争斗将把香港带进一种“自残”的局面，香港将会由盛转衰，正如不少在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的城市后来走向没落一样。但是，如果理性和务实的精神最终能制约“占中”和所谓“不合作运动”所代表的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香港的前途仍是光明的，青年人便可对未来抱有信心和希望。今天，香港正处于这样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个危急存亡之秋，希望你们积极面对，对形势做出正确的评估，并就自己应该信仰的价值理念做出明智的选择。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国两制的构想刚形成的时候，当时香港还是一个殖民地，没有民主，但有法治和相当程度的自由。所以当时一国两制的构想主要是要在香港回归后保留原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法治和自由。至于一国两制下香港实行怎样的政治制度，最后由全国人大在 1990 年通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确定下来。基本法规定特区行政长官由香港社会四大界别的代表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推选，然后由中央任命，又规定特区立法会议席部分由市民直选产生，部分由功能团体选举产生。同时，基本法规定了特区政制可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进行改革，最终达致普选。

因此，根据基本法的政制设计，随着时间的流逝，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制将会变得越来越民主，但如果中国内地的社会主义政制维持不变的话，香港和内地的政制的差距将会变得越来越大，我认为这便是一国两制的最深层次的矛盾。香港的政制的民主化，是否表示它最终要实现西方式的民主普选或所谓符合国际标准的民主普选？今年 8 月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就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当然这是中央的答案，并非所有香港市民都会认同。中央给

出的答案是，在 2017 年香港首次实行特首普选时，候选人的提名必须根据基本法第 45 条的规定，由提名委员会提名，提名委员会须按照现有的选举委员会设计，同时，提名委员会须以过半数的多数提名 2 至 3 名候选人。毋庸讳言，这种提名制度难以符合适用于一般民主国家的国际标准，在这些国家，没有提名委员会，候选人一般由政党提名或公民提名，人数没有上限。中央的官员已经明确表示，今次人大所采纳的这个制度设计乃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其目的是确保候选人都是爱国爱港而非与中央对抗的人，从而保证最终当选的特首候选人是一个同时得到中央信任和港人拥护的人、一个中央乐意任命为特首的人。

我完全明白不少港人，包括不少我的同事、朋友和学生，都认为中央这个决定是不能接受的，他们其中有些人选择抗争，进行公民抗命。但是我留意到即使西方学界提倡的公民抗命理论也特别提到，违法的公民抗命行为是否在道德上得以成立，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该行为的后果，包括该行为是否能够达致其目标（如促成有关政策的改变），和该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是否利多于弊或弊多于利。在这方面，西方法理学家也曾指出，如果有关行为可能导致到社会中越来越多人不尊重法律的权威，这应算是有关行为的恶果。

我个人的意见是，人大在八月的决定明显反映中央认为香港暂时不适宜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普选、只能实行某种具有一国两制特色的民主普选，这是一个基本国策，基于中央政府的“维稳”和防止外国势力通过香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颠覆等考虑。我相信任何熟悉中国政治的人都会同意，无论香港出现怎样的占领活动，都没有可能改变这个国策。忠言逆耳，很多香港人都不愿意听到这种话，但这的确是政治现实，就正如香港在殖民地时代由外国人统治而没有民主是当时的政治现实一样。香港有今天的成就，正是因为港人——包括各位同学的父母以至他们的上一代——是理性和务实的，他们接受那些不能改变的政治现实，并在他们所能够享有的有限空间中默默耕耘，胼手砥足，创造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奇迹，于是这颗东方之珠便应运而生。

与 1980 年代相比，香港对中国的经济的重要性已经今非昔比。中央对香港的民主化的基本国策既定，港人必须自求多福，在一国两制的夹缝中寻求生存之道，珍惜我们所享有的自由空间，尽量创造，继续发挥狮子山下的精神，维护我们现有的法治、宪政、人权和公民社会，并且停止内斗，停止所有伤害香港的“占领”和“不合作”活动，因为最终受害的将会是全体香港市民。无论抗争者的理想如何高尚，无论他们的用意如何善良，都不能改变他们的行为的客观后果，就是不少香港市民的权益受损，如果持续下去，全港市民安居乐业的权利也会受到侵犯，而安居乐业也是一种基本人权。

各位同学，你们年青，香港的未来是属于你们的。希望你们好好思考，好好学习，好好生活，好好行动。



陈弘毅 上

2014 年 10 月 25 日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李知乐：给陈弘毅老师的一封回信

李知乐：香港学生，参与香港占领运动

陈师弘毅尊鉴：

老师，论学识我自比不上，所以我只能以一颗灼热的、也许过于天真的赤子之心回应您。自 9 月 26 日以来，我睡过政府总部，睡过添马公园，睡得最多的还是弥敦道。明明站到防守线第一行了，却还没吃过胡椒喷雾，没吃过催泪弹，没吃过警棍，反而结交了一群出生入死的战友，可真幸运呢。老师，占领运动至今一个月，我在各占领区所看到的是一张张疲惫却越趋坚强的脸孔，我在占领区看到的是狮子山精神的再现：学生冲入公民广场的那个晚上，我拿着纸皮箱呼喊道："纸巾！谁有纸巾！水！需要纸巾和水！"不消一刻，一个纸皮箱满满的都是急救用品。几个男生捧起箱子就往前线跑，也顾不得危险。后来我不知怎的站到了中信防线的首行 ，后面两个男生——阿耀跟阿锋——硬是要我跟另一个女生站到后排去。"女生别站第一行，很危险的！这些事该由男人做！"我说男人女人不都一样是人，有什么关系，还用女权主义教训了他们一顿呢。那时候什么物资都没有，我们只能撕破几个胶袋勉强掩住眼睛跟口鼻，站首行的拿着几把雨伞稍作抵挡而已。警察跟我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可不知怎的，我们手绕着手，以肉身作抵挡，信念却坚定得很。后来大家累了，便席地而坐，边聊天边分吃一些市民送来的干粮饮料（当时物资有限，是真的几个人分喝一瓶运动饮料）。警察稍有举动，我们便又霍然而起；有些人一时沉不住气或对警察破口大骂，或要往前冲，其他人总会劝他们克制，提醒他们和平理性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老师，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香港——这不是老一辈口中，那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香港吗？

老师，你说中央的国策既定，香港人只能接受这政治现实，接受这带有一国两制特色的"普选"。你说，上一辈的人均因接受香港是英国殖民地这政治现实，才得以缔造今日的香港。所以今日的香港人亦因该默默接受中央的决策，以香港的经济及繁荣稳定爲重，哑忍其暴行。在牢笼里出生，难道就要一辈子活在牢笼里吗？笼中鸟渴望飞翔很不务实、很不理性吗？你说，中国的国策基于国家安全、维稳、防止外国势力颠覆等考虑。试问老师，中央是为什么如此惶恐呢？古语有云，作贼者心虚，或许一个需要以坦克、以子弹维护自己权力的政权，每天都要活在惧怕自己被颠覆的惶恐当中吧。老师，很抱歉，在这样扭曲的政治现实下"寻求生存之道，珍惜我们所享有的自由空间，尽量发挥"云云算不上是狮子山精神。那只是毫无尊严的苟且偷生，我做不到。

再者，老师你难道不知道，占领运动得以有今天的规模，背后还有许多许多的原因？我们之所以餐风饮露，是因为那粥面店、文具店、面包店、小吃摊的身影渐渐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大型购物商场、金饰珠宝店、连锁商店和源源不绝的行李箱。你在街道上听到的、看到的不再是广东话、繁体字。默默耕耘一辈子，买不起一个安乐窝。社会结构不再流动，我们又回到世袭阶级的年代。这是一个势利眼、金钱眼、商人当道的社会。免费电视被垄断，是非颠倒、黑白混沌。老师，现在五十者不可衣帛，七十者不可食肉，颁白者负戴于道路，黎民即饥且寒，正因为政府不王，人民不得安居乐业，我们才要实行一连串的不合作及占领运动。难道我们只可默默接受这现实，看着我们所认识的香港渐渐消逝吗？

老师，到底是谁在制造分化？是谁不尊重法律？是谁与与当权者勾肩搭背，以下三流手段冲击参与占领运动的市民？反智的维稳五毛？良心泯灭，只会对当权者摇头摆尾的建制派？某些对当权者俯首称臣的媒体？抑或沉睡在铁屋子里不愿张目的懦夫？记得罢课期间上了陈秀慧老师一课，她提到，中央所谓的“落闸”其实并没有法理基础，因那算不上是释法。再者，按照现有的选举委员会所成立的提名委员会何来有“广泛代表性”？2 至 3 人的规范从基本法哪里来？老师，视人大一言一语为圣旨的当权者才是破坏法治的恶人。一个政治机构得以实行释法权才是对法律的不尊重。

老师，正因为香港的未来属于我们，我们才不忍看着她沉沦。我们不希望他朝回首时香港已变得满目疮痍。路是人走出来的。我们年轻，我们得撑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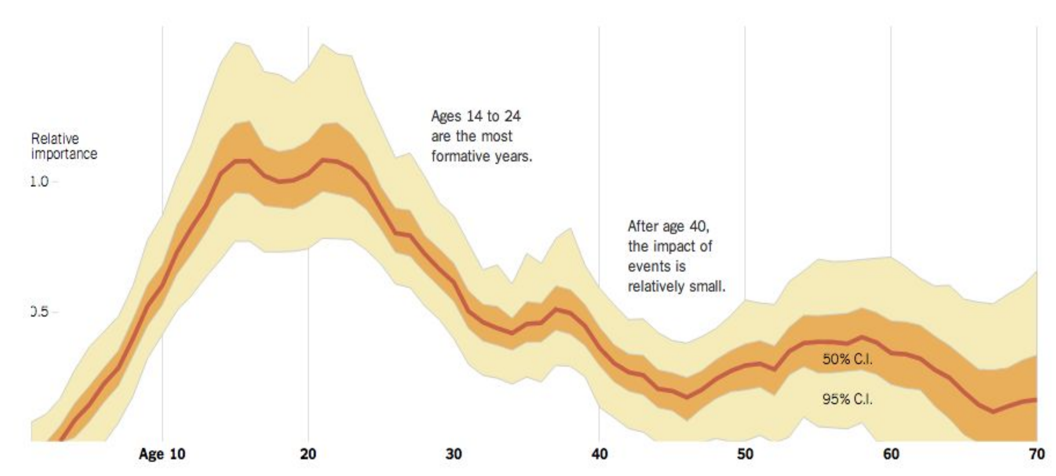
生李知乐 谨呈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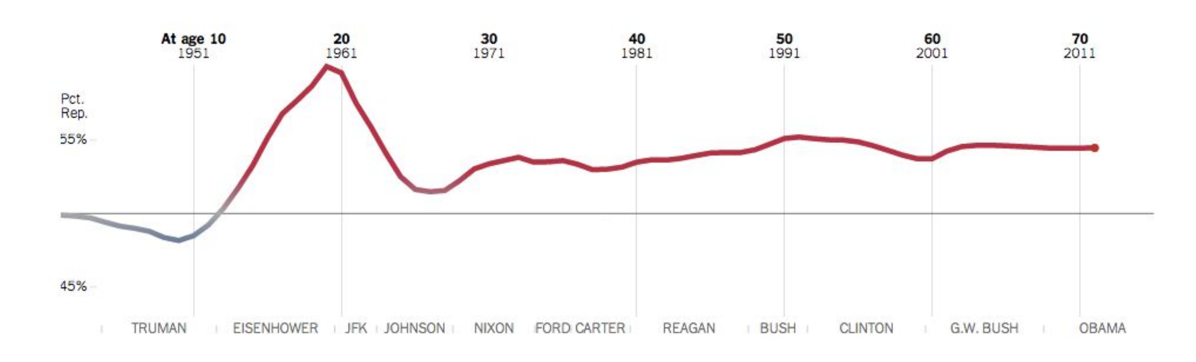
【2】

纽约时报 upshot：
出生年代是如何影响政治观点的？

民主党资讯分析机构 Catalist 和哥伦比亚大学运用新软件分析数十万选举人数据资料，研究美国人在不同世代的政治倾向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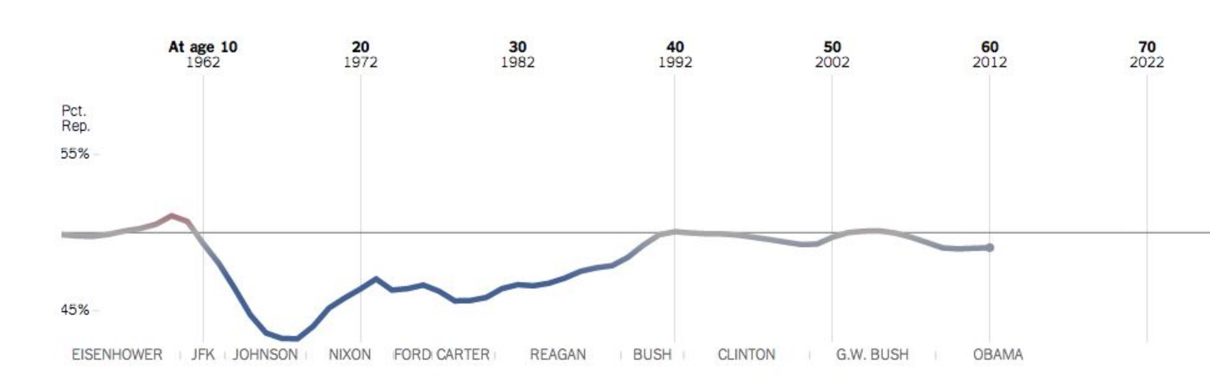


由图所示，18 岁发生的事件对一个人的影响大过 40 岁三倍。整体可见，14 至 24 岁发生的事件，对一个选民一生的政治倾向产生尤为重大的影响。这个影响随着年龄的增加，呈下降趋势。



以出生于 1941 年的白人为例，他们青少年时期经在任总统刚好是二战英雄艾森豪威尔，到艾森豪于 1961 年卸任时，他们刚好 20 岁，造成的结果是，此世代选民大多数都支持共和党。





生于 1951 年者，也就是战后婴儿潮世代，他们青少年时期历经美国人权运动以及越战，受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丑闻影响，这个世代更加倾向民主党。

本文由 Co-China 周刊编辑胡馨以编译，原文链接

http://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4/07/08/upshot/how-the-year-you-were-born-influences-your-politics.html?_r=0&abt=0002&abg=0 点击原文有自 1937 至 1994 出生世代的政治倾向动图显示。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荐书：《四代香港人》



作者： 吕大乐

出版社： 近一步多媒体有限公司

出版年： 2007

页数： 68

丛书： 一步十年

图书介绍来自凤凰视频——开卷八分钟，梁文道：被误读的《四代香港人》。

大陆流行“80 后”这样的一个称呼已经好几年了，香港是直到去年年底，大家才开始忽然认真讨论什么叫做“香港的 80 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件呢？如果你常盯着我们电视台的新闻瞧的话，你也许会知道，就是香港在去年年底曾经发生过一群很重要的事件，就是一群的年轻人，主要是一些 80 后的年轻人，他们去反对在香港兴建高速铁路，通往广州的这个铁路，主要原因就是这裡面牵涉到一些公平和正义的问题。而且这裡面还牵扯到一些香港的农村或者兴建地区的破坏等等。

那么这一群 80 后带着一些不同的价值观，崭新的运动观念，涌入到了香港的主流媒体裡面，使得香港政府、主流社会全部大吃一惊，不知道这批年轻人是从哪裡跑出来的。然后随之而来就是一连串的争论，在这场争论裡面，有一本书或者有一个学者常常被人提起，其实这个人在香港已经非常有名了，他就是有名的社会学家吕大乐。他这本书，与其说是

书，倒不如说是一篇文章，只不过以一个册子的形式出现。这本小说是几年前就出版了，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四代香港人》。

为什么吕大乐和他这本《四代香港人》会忽然成为一个争论的中心呢？这是因为有很多人，尤其支持这些 80 后的年轻人，觉得吕大乐是一个很保守的人，觉得他这本《四代香港人》的观念也很保守，在为一个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说话。那么的确吕大乐当然有他保守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对这本书有一点误读，对于不知道这整个背景来龙去脉的朋友不要紧，我给你简单讲一下这本书讲的是什么，也许你能够从这本裡面，更清楚地了解到一点香港的故事。

首先这四代人是怎么一个算法，什么叫四代香港人。是这样的，吕大乐从二战之后开始算下来，香港总共出现了四代人。那么这四代人的说法，并不是一个他的独创，而是你看很多社会学家或者人口学家在讲整个世界战后，都会有这样一个四代观念的区分。那么战后第一代，主要就是战前早就已经出生，挨过了二次大战的痛苦日子，在战后努力含辛茹苦的重建家园的这一批人。

对于这一代来到香港的人，其实很多都是难民，有的是逃避二战的战祸，有的是逃避国共的内战。那么解放之后又来了一大批人，二战之后，这一批人等于是建设香港的第一代，也就是战后出生的所谓婴儿潮时代。吕大乐对于这一代人的描述是充满了温情的，他觉得这一代人都在无私地为了下一代人而奉献。

然后他就说，现在回头再看，战后出生的婴儿潮那一代人享受的生活空间，可能连今天已届中年的战后婴儿自己也觉得难以接受。那个时候天空海阔，很多事情都能够以尝试新鲜事物之名，一次又一次的“偷鸡”，“偷鸡”这是个广东话，就是偷偷干。那时候只要打着新这个招牌，万事好商量，很多事情都会多留几分空间。

他想讲的是什么呢？他想提一个重点，就是那代人的父母虽然保守，但是问题是他们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对未来想法的开放程度，其实可能比今天婴儿潮时代自己当了父母之后的情况还要开放，还要大胆。反过来说，今天的婴儿潮时代，在社会裡面是个掌权阶级，但其实他已经比他们父母那一代，其实还要保守，他们在社会上面营造出来的开放空间也远远不够。

好，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婴儿潮时代是怎么样的一代人，这一代人很奇怪的地方在哪。就是他们是战后出生，尤其香港这个地方，接受当时西方流行文化洗礼，迷过 Beatles，赶上了嬉皮的潮流，有反叛的精神。那个时候他们流行说的话，不要相信 30 岁以上的人。可是这一批人到了现在，他们却觉得只有 30 岁以上的人才可信。同样的曾几何时，他们认为 30 岁之前不读马克斯，或任何其他激进思潮的，缺乏激情，不够浪漫，难成大气。年过 30 之后的战后婴儿，却认为几十岁人仍然激进，则代表没有长大，不够成熟。



那么这一批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我想这是吕大乐这本书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么问题是我们要注意这一批人，他们是香港社会某种意义上的主流，为什么？因为在年龄阶层来看，他们这批人人口太多了。1966 年的时候，年龄 19 岁以下的青年，占当时总人口的 50.5%，就是一半以上。那么这一批人，很自然的就会把自己的问题当做是全香港的问题，替整个香港社会制订议程。

而且这批人，因为在一个剧烈的竞争环境底下成长，而那个时候社会非常开放，空间很多，经济在爆发时期，所以他们能够“上位”，广东话什么玩意儿，就说能够往上升的机会也很多，所以他们变得相信竞争。对他们来说竞争不只是个过程，更是个意识形态，而且他们有一种信念，认为自己得到的一切都是凭个人的实力跟苦干、聪明、机警、灵敏，而不是整个社会结构或者外部国际局势、经济变化造成的结果。

但是快速的经济发展、长期的顺进，确实会令人选择性的整理个人经历，只记得自己力争上游，而忘记了当时社会形势如何不断地大量地给他们制造机会，于是他们就把自己那一套当成了是日后的世界也永远都应该是这样的。于是接下来他们那一代人，也就是我这一代人，所谓第三代人，就是六十年代末，或者是七十年代生的这一批人。那么这批人是怎么样呢？这批人他们面对新环境，这个新环境裡面机会不是消失了，而是不再全面开放。进入职场的新一代发现随着弹性僱佣制的普及， 僱佣机构的结构趋向扁平，不像以前那么科层化，一层一层，新增的经理，管理职位因此就会减少了。

于是你这个社会往上流动的阶级也就少了，那么这一批人就会苦于自己总是没有出路的感觉。我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拿香港跟大陆对比最容易看得出来了。我们看看，在大陆，就拿我熟悉的媒体行业来讲，我发现很多报纸的老总、编辑居然都是 30 多，40 岁，跟我年纪差不多。而像我这种年纪的人，在香港，如果你仍然在媒体工作、在报纸工作，干到这个岁数，你可能就只是个採访主任，那个总编和社长，可能都是一些五、六十岁的人。也就是说香港这个社会机会已经缩减了，经济发展到这个程度。

所以很多人说吕大乐保守，就是因为他用这样一个角度来解读今天 80 后或者 70 后面对的问题；可是你也可以说他是激进的，因为他就在反省他那一代人的缺失，他那一代人的得天独厚，是如何依赖于社会环境，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3】

夏瑛：香港“80 后”的“新社会运动”



夏瑛：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博士，现为中山大学政治科学系教师

“

这么多年了，看惯了不痛不痒、温和保守的抗争行为的香港人，如今突然目睹如此激烈的一幕，怎能不大吃一惊？而更令他们不解的是，这一群年轻人何以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集聚到同一地点，并采取如此看似激烈实则秩序井然的行动？

”

香港的反高铁运动已过去半年有多，然而关于它的讨论却一直延续至今。关注过此次运动的本地人，当他们第一次从电视画面上，看到那一群高喊着口号在立法会门前集会并与现场警察发生肢体冲突的年轻人的时候，多少还是有些震惊的。这么多年了，看惯了不痛不痒、温和保守的抗争行为的香港人，如今突然目睹如此激烈的一幕，怎能不大吃一惊？而更令他们不解的是，这一群年轻人何以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集聚到同一地点，并采取如此看似激烈实则秩序井然的行动？更何况，当他们正对着电视画面发呆沉思的时候，猛然一惊醒，才发现晃动镜头下那个正在大声疾呼的年轻人竟是自己的子女。

新社会运动时代到来？

几乎一夜之间，“80 后”这一名词飘遍了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电视直播让全城都目睹了这些年轻人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的那一刻，要知道，警察可是香港人心目中最值得信任的政府机器，以往游行集会的参与者从来都是与警察“和平相处”的。而如今，“80 后”不止一次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如此的视觉冲击不断地挑战着香港人保守求稳的传统价值观。“80 后”如此出位的行为令全城哗然。于是，“激进”、“躁动”、“不安”……人们开始用这样的字眼形容这一群“怪异”的青年人。大多数人觉得也许这只是年轻人在荷尔蒙作用下的偶然宣泄，上街抗争就好比游乐嘉年华，年轻人情绪得到发泄之后自会各自回家安分过生活。



然而，后面的事却又一次让他们出乎意料。反高铁运动之后，作为生力军的“80 后”们并没有就此作罢，反而更加频繁、以更加多样化的新奇方式参与到其他议题的抗争运动中。“80 后”现象显然不是昙花一现，这群年轻人已然成为香港社会运动中的中坚力量，他们用全新的方式摸索和诠释着本土的“新社会运动”。

不知从何时开始，本土的公共评论开始将有“80 后”参与的社会运动标签为“新社会运动”。“新社会运动”这个名词，是一个西方舶来的概念，其大抵是指西方国家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绿色环保运动、女权运动、和平运动等概念性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不同于战后初期的旧式社会运动：他们表达的是对人类“生活世界 life－world”（如社区、城市或者环境）而非物质利益（如经济增长、财富分配或者人身安全）的关怀；他们采取的是非组织化、松散网络化，而非高度组织化、制度化的行动方式；他们所崇尚并传达的是自我解放、独立个性、身份意识、反权威、反官僚体系的价值观念，而非工具理性、权威、秩序的价值观。

从这些方面来说，香港“80 后”确实开辟了本土的新社运时代。他们在议会政治和传统社运之外另辟蹊径。他们并没有高度组织化和制度化的组织形式，参与者大多通过网络平台和松散的人际网络传递信息和组织活动；他们反对一切“权威”，声言要表达自己的意愿、要参与政治的过程、要伸张社会的公义、要选举代表自己的政府。然而，从另外一方面来说，香港的“80 后”运动又落后于西方的新社会运动，在这里，环保运动或者女权运动还只是社会运动的边缘领域，社会焦点集中关注的还是西方在一个世纪前便已取得的民主普选。

实际上，如今“80 后”的最初力量来源于 2006 年的保卫天星码头的社会运动。这一事件虽在当时亦曾掀起波澜，但不久也便消失在公众论述中。时隔数年，当年保卫运动的主力人员也逐渐意识到香港社会最紧要的诉求乃是争取普选的民主诉求，在这个阶段单论“生活质量”等概念性诉求似乎有些超前，于是他们也在调整策略，将抗争目标重新定位于争取普选。如此说来，香港“80 后”所开辟的是一种独特的港式新社运，他们有着西方新社会运动的理念和行动策略，所争取的却是西方在一个世纪前便已实现的民主议题。

在沉默中变迁了的政治生态

“80 后”的“激进”形象在一夜之间为人熟知，而他们的情绪也在一夜之间沿着这个城市的脉搏传递至无数个拥有共同经验和相同价值认同的年轻人。一时间，愈来愈多的年轻人被某种情绪感染，从不同的生活轨迹聚集一处，拥抱彼此，传达意愿。曾几何时，香港人



还是那一群对政治和公共事务漠不关心，只埋头赚钱的“经济动物”，而如今，似乎瞬息之间，全城的年轻人开始躁动不安，他们开始读报，开始讨论，开始为了一群完全不相干的乡民走上街头，开始意识到表达意愿、参与政治是公民应尽的责任，开始抗拒权威不够民主的安排，高呼 “自己决定自己发展的方向”。

所谓万事皆有渊源，今日公民社会的新气象其实只是近二十多年来政治生态渐进变迁的必然产物。1982 年，香港开始在区议会选举中引入民选制度，此后二十多年来的民主实践，虽然进展缓慢且影响有限，却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港人的民主意识也培养了他们的民主技能。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生来便处于民主化的环境中，接触到的是民主理念，经历的却是缓慢的民主化进程。理念与事实之间的落差所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加之贫富差距愈加严重所导致的社会不公现象，以及过去三十多年收效甚微的传统抗争模式，所有这些，让意气风发富有想法的年轻人对旧有的一切产生政治疲倦，于是他们拍案而起， “上一代已黔驴技穷，就让我们年轻这一代做些更加轰轰烈烈的事吧！”不可否认的是， 香港这个金融经济大都市已经向着泛政治化的趋势发展，而年轻人的政治参与成为这个政治化过程中的奇葩一朵。

后物质主义

很多人从“80 后”新现象中引申出世代更替的论述。

这一代人的理想与激进已然覆盖了上一代人的务实与保守。也有学者开始寻找这一时代变迁的根源。有学者认为如今这一代年轻人虽然成长于较为富裕的环境下，然而他们所面临的却是越来越缩窄的向上流动的通道、大学普及之后愈来愈微弱的高等教育的比较优势、经济结构单一化之下愈来愈有限的职业选择，以及职业内部世代更替落后与人口世代更替所导致的愈来愈有限的就业机会，于是，年轻人满脑子是父辈中“只要努力奋斗便可上位”的成功经验，现实中却面临持续恶化的向上流动的处境，他们变得不安，而参与社会运动正好成为他们发泄不安情绪的有效渠道。

这样的解释自有一番道理。然而，若我们仔细观察参与社运的“80 后”核心成员，会发现，他们多数从事于收入较高的行业，其经济状况并非所论述的那般不堪。相比之下，倒是更相信世代之间存在着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变迁的可能。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概念首先由西方学者殷格哈特提出，他认为在不同历史时期下成长起来的人会有不同的价值观体系，人们倾向于将自身最迫切的需要转化为最主要的价值追求。也就是说，生长于工业化时代和战争时期的人们倾向于注重经济利益和人身安全；而生长于后工业化和和平年代的人们则倾向于强调自我实现的价值多过于物质利益。回到



香港的环境，上一代人成长的时代正是香港高速工业化的阶段，那是一个艰苦但充满机会的年代，香港经济发展的神话同时也成就了诸多白手起家的个人奇迹。当时许多难民初来这块宝地，他们首要的目的当然是努力赚钱维持生计。待如今这一代年轻人初长成的时期，香港已完成了工业化的阶段，他们无需像父辈那样忍受对战争的恐惧以及养家糊口的困苦，他们生长在相对平和和宽松的环境，在学堂接受着各种思想的熏陶，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思考和讨论个体的价值，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重新审视自我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去认识和实现对其父辈来说尚且奢侈的自我实现的价值。 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们自然会与父辈们所信奉的价值观念有所不同。“80 后”现象背后呈现出来的世代更替与时代变迁或许已引发了整个社会民主运动的范式转移。在这种状况下，政府原有的咨询式治理模式显然已无法满足社会对民主的新诉求。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张洁平：摊牌（三）：抗命世代



张洁平：自由撰稿人，现居香港

“

我抬起头，刚刚那个冷静、理性、果敢的学生领袖好像不见了，24 岁的男生呜呜地哭起来，像个孩子一样嚼着泪水，含糊地说：‘……但是根本没有希望。’

”

“现场的示威者请留意，这是警方发出的警告：你们正在进行未经批准的公众集会活动，违反法例第 245 章公安条例第 7 条规定，你们可能会被检控。”

凌晨两点，高音喇叭传出的严厉男声一遍遍地急促重复，压向坐在马路中间的每一个人。没有人动。人群也几乎没有起伏。五六百人静静地坐着，街灯明亮的暖光，照得每一张面孔都轮廓分明——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那么年轻。

这里是 7 月 2 日的中环遮打道。刚刚过去的白天，15 万香港人喊着“我要真普选”、“梁振英下台”的口号，从烈日与暴雨中的维多利亚公园一路走到夜色中的这里，创下 10 年来这座城市游行规模的最高纪录。

与以往不同的是，许多人并没有就此散去。在游行的终点，香港专上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发起了“公民抗命后续行动”。这个由全港各大学学生会联合而成的学生组织，决定在不提前向警方申请的情况下，从 7 月 2 日零点开始，通宵占据遮打道直到 7 月 2 日早晨八点。不提前申请意味着行动违法，会面临拘捕乃至检控。而视此行动为“抗命”的人们并不打算反抗。

这也是自 2013 年 3 月“占领中环”运动发起以来，它所提倡的以公民抗命争取普选的行动理念第一次被实践。实践者，不是运动的发起人——他们认为“时机未到”，行动还缺乏理据——而是一群 20 岁出头的年轻人。

零点将至，周围的街巷里警察渐渐多了起来，大学生走上白天游行留下的主舞台，面对台下没有离开的民众，诚恳以告：“留在这里不是消遣，留在这里会被人抓，被人告，不是开玩笑的。这就是‘抗命’。如果决定留下，请大家做好心理准备……保持冷静，互相守望，不做反抗。”

在后台的阴影里，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告诉我，香港争取了这么多年的民主普选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他们不可以什么都不做，干等命运降临。他说："如果还是在一个已经僵化的体制里去跟他博弈，实在很难有 significant progress（大的进展）。时机不是靠等待，是靠争取。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和这个体制对抗，去拿回我们本来就应得的民主权利。学生就该是这股抗争力量中最重要的一支……今天走出来，我们学生，其实责无旁贷。"

他的黑色眼镜在汗水里东倒西歪，脸上还留着没有刮干净的胡茬，但讲起话来，却有一种同龄人少见的深思熟虑的平静。

周永康 1990 年出生，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三年级学生，港大学学生会外务副主席，4 月才被推选为学联秘书长，7 月 2 日就站在这里，参与和带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公民抗命。"我们预备好了承担责任，付出代价"，他抹一把汗，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表情庄严而紧张。

一、

一直以法治、秩序自我称许的香港，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像现在这样，激进的"公民抗命"成了全城都在讨论的话题，进而成了许多人孤注一掷的选择。

这是埋藏了 30 年的悬念揭幕的时刻。香港 2017 年到底能否如人大在 2007 年承诺的那样，争来民主普选？幕布背后是北京的答案，答案背后却牵动着这座城市累积多年的民情变化、世代更迭、以及人心向背。

8 月初，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的一份民调曾提问，"如果政府提出的 2017 年行政长官选举方案会造成政治筛选候选人，令不同政见的人不能够参选，你是否接受？"60%的受访者表示宁可不接受，希望立法会否决方案；而 31%的受访者则支持拿到手再说。其中，18 至 39 岁的年轻人中，不接受的比例高达 80%。

如果比较 2005 年、2010 年政改的相关民调数据，你会发现，随着香港社会等待民主的时间越长，人们的耐心越消耗，对北京的信任度越低，民意也越发趋向激进——认为如果没有真普选就宁可不要阶段性政改的受访者，比例一直在升高，到了 2014 年几乎比 2010 年翻倍，而且首次超过半数成为主流民意。年轻一代，就是这部分民意最重要的基石。

同时，以公民抗命为核心行动理念的"占领中环"运动，根据 2014 年 1 月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学教授 Michael DeGolyer 所做的调查，得到 38％的香港市民支持，54％反对；而在 21 至 30 岁的年轻人中，支持率竟然高达 69％。



正是在民议如沸时，2014 年 8 月 3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全票通过了关于香港政治改革的决议，给香港将要实行的普选定下框架——与其说是“框架”，不如说是详细定案：明确规定选举的提名委员会人数按照此前 1200 人的选举委员会设立，由工商界、专业界等四大界别构成，在这个人数分配设置明显亲北京和工商界利益的架构中，有意参选特首的人必须要获得提委会“过半数”支持才可能成为候选人，特首候选人数目定于 2-3 人。而特首候选人必须“爱国爱港”——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张德江的定义，即是“支持结束一党专政人士不可接受”。

自香港政府从去年底启动普选咨询以来，从政党到民间，从建制派到民主派，香港社会提出过 30 多种完整的普选方案建议，而人大决议的这个结果，比所有的民间方案、包括被民主派视为最保守的建制派方案都更加保守。这个方案意味着，不受北京信任的参选人无论民望多高，都会被提前筛走。研究民主理论的权威学者、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 Larry Diamond 回应香港《南华早报》时称，这样的所谓“普选”实际是伊朗的操控式选举，“坦白讲，他们甚至都懒得假装民主”。

按照法定程序，人大决议之后，这个普选方案仍需由香港政府交回立法会表决，2/3 票数通过，才可定案。因此，人大同时表明，如果这个方案被香港立法会否决，则 2017 年特首选举会继续沿用 2012 年的代议式特首选举产生办法；而 2017 年之后一直到未来，香港若要实行普选，都必须遵循人大这个方案，决议长期适用。

对坐在电视机前，收看人大记者会直播的香港人来说，这一刻五味杂陈。

最感悲愤的是一直以来“中间路线”的倡导者。在有关民主的旷日持久的争论中，他们一直站在“香港人要什么样的普选？”和“北京会不会给？”两个问题中间，希望取得最大公约数，既维持与中央的良好关系，同时也推进政改，最终达到一个北京可以接受的真普选。在香港政坛，温和民主派与开明建制派，正是这种“中间路线”最主要的倡导者，也代表着民意主流。

民主派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汤家骅便是“中间路线”其中一员，他过往的温和立场甚至常被激进者攻击为“卖港”。在人大决议宣布之后，汤家骅在电视新闻节目中忍不住哽咽，他情绪激动地说这是“香港民主进程中最黑暗的一天”，自己“难以接受、非常失望、非常痛心”，也看不到还有任何可以谈的空间。

“占领中环”运动的发起人、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表示，这“不光是香港民主运动黑暗的一天，还是一国两制黑暗的一天”。“占中”主张只有到了最后时刻，如果没有真普选，才占领中环；并把“最后时刻”推至普选方案最终定案之时，把“真普选”的定义放在民主派最温和的底线“符合国际标准”。戴耀廷一直希望在一个激进的行动想像倒



逼之下，可以尽可能拓宽谈判空间，他甚至预先为北京可能出台的中间方案，做好了与激进民意沟通的准备。

然而，“最后时刻”不由分说，轰然而至。

“占领中环”运动在人大决议后发布新闻稿：“我们非常难过地说：今天对话之路已经走尽，占中必定发生。”25 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坚称会发挥立法会内 1/3 的关键少数票，在普选方案交由立法会表决时，集体否决这个方案。学生团体则表态，会以全港大学生、中学生同时集体罢课的行动开启“占中”的序幕。

此时此刻，显得最平静而决绝的是年轻人。

8 月 31 日下午 4 点 05 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向正在看直播的香港市民致以问候”时，24 岁的周永康对着电视机竖起了中指。

他和 50 多个来自全港各个大学的学生代表聚集在学联办公室，收看全国人大记者会的现场直播。在这个被书、标语、横幅、黄丝带、喇叭，还有卷成一团的床单堆满的大办公室，当李飞的官式普通话响起，大多数学生只是一边低头刷手机，在电脑上工作，一边静静地听，彷彿那些话与自己身处的世界并没有多大关系。有人忍不住，比如在李飞讲到“过半数”、“爱国爱港”、“实现普选”等字眼时，学联常务秘书、香港中文大学三年级学生钟耀华低声骂道：“丢——”（粤语粗口），他的女朋友叶咏琳却在一旁不以为意：“有什么好‘丢’的，几个月前我已经‘丢’过了，这一刻反而轻松，因为答案简单明了：香港人，抗命。”

直播开始前，22 岁的钟耀华在 Facebook 上写下自己的感受：“在一个有关港人命运的重大决定上，我们依然没有参与的份儿，居然要靠电视直播来迎候强加于身的命运。三十年前是这样，三十年后一切如旧。这真是对香港人的羞辱。我们不要再接受京官的耳听面提，要出来夺回理属已身的政治主体性。今天是历史的新页，往后怎么写，得看我们的决心了。”

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安排了这次聚会。电视直播结束后，大家纷纷交出手机，用纸袋装着，集体堆在厕所旁边的角落——这是近一年多以来学联开会的新传统，为了防止窃听——然后，学联的第一次罢课筹备大会开始了。在场的 50 多个同学，正是接下来即将在各个高校发起的罢课行动的主力。在周永康看来，这像是一个仪式，是屈辱，更是奋进。和同学们一起收下“民主”的死亡通知书，也正可以一起丢掉幻想，“让现实颠覆幻想，逼使港人狠下决心另走一条生路”，他说。



社会运动的研究者、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罗永生把今天的这群年轻人称为“主流的反叛者”，他说以前在香港搞社运的都是边缘人，但“现在走出来的很多都是精英学生，用的都是很好的技巧。他们本来应该站在社会里比较中间的位置，不是偏锋和激进的人，但却走出来公民抗命。”

“好学生反叛，就反证社会已经出了大问题了。”罗永生感叹。

二、

相比中文名，周永康更习惯朋友们叫他 Alex。和大陆反腐败运动的标靶人物同名同姓，让这男孩没少被身边同学开玩笑。“喂，周永康，你不是被抓了吗？怎么偷渡到香港来了？”“周永康，又上头条了喂！”他一律回个鬼脸，卖萌了事。“讲真，都不是很清楚周永康是谁……”这个周永康说。

他出生在中产家庭，爸爸是 70 年代香港大学毕业生，开明谨慎，常常告诫儿子“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妈妈年轻时从大陆到香港，强势干练，却因为见识过共产党残酷的政治斗争，一听见儿子说中共的坏话，就紧张得不行。

中学时，周永康算是不折不扣的文学青年，斯文沉默，爱读小说。他喜欢本土作家刘以鬯，从刘的短篇小说《动乱》里认识香港的六七暴动，“文学原来可以这样把历史记录下来，让后人跨越时空去体会”；喜欢钱钟书、梁实秋，“民国时代这么纷乱，民国人的生活态度竟然是这样的”；还有白先勇，“去了台湾的人对中国的想像，那种怨恨纠结，很有味道”……“文以载道”，这是文学吸引他的方式。他成绩很好，考进香港大学，读比较文学，兼修社会学。

在读大学之前，他对社会运动的参与，仅止于维多利亚公园的六四烛光集会。在中学的一次早会上，历史老师播放了一部有关六四事件的短片，一向风趣的电脑科男老师在课堂上边看边哭了起来，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有关 1989 的影像，深受震撼。“六四可以说是我们这代人第一次接触公共领域的门槛，我们绝大部份对政治、社会议题的关心，都是从六四开始的”，在 7 月的一次晚餐中，周永康告诉我。

每一个我在学联遇到的年轻人都这么说。“我怎么会接触政治？第一件事就是六四。每年的五月初，你看一下报章，都会开始讲六四，一直到烛光晚会，年年的报章都会报导，十几万人啊如何如何。我就在想，哇，十几二十万人就去那里坐着？打机不好吗？拍拖不好吗？为什么香港有班人这么执着的？为什么呢？然后就会去找六四是什么，北京发生了什么，香港的反应是什么。……对我来说，这就是启蒙。”这是钟耀华的说法。而中学不谙

世事，到了大学通识课才开始恶补香港与中国公民社会知识的叶咏琳，参加的第一次社会运动，就是 2012 年香港市民为六四受难者李旺阳“被自杀”事件抗议的游行。

周永康说，对 1990 年之后在香港出生的他们来说，六四同时也是理解中国的起点：“每一年，到了六四那一周，重新看回那些画面，看当时学生的理想，都会很感动，很受鼓舞。而看到人性被那样粗暴地践踏，也会有强烈的情绪……有人讲六四事件很复杂，但是人民希望改变国家，国家却用军队来镇压，这一点黑白分明。坦白讲，我是从六四认识中国，对中国共产党再不会有什么好感。”

因为“不爱说话、喜欢读书”，进港大后，周永康加入了校内唯一一份文字媒体：学生会刊物《学苑》，并当选副总编辑。这一年，正是《学苑》创刊 60 周年。

作为本港历史最悠久的学生刊物，1952 年创办的《学苑》关切时局，人才辈出，在港大内外都曾有过广泛的影响力，从 60 年代到 80 年代更是香港学运与社运的重要论述阵地。90 年代之后，回归进程启动，怀抱理想的大学生很多都离开社会运动，投身新政府或者议会，希望在建制内实现一国两制所承诺的“港人治港“。《学苑》也随着学运的退潮而锋芒减弱，退回一本普通的校园刊物。

然而大时代的尘埃并没有落定。政治上悬而未决的半民主状态，在回归之后不过维持了五六年时间，就诱发了管治危机。非民选的政府和议会无法回应政治意识和本土意识都在觉醒的民意，民意转而诉诸街头，社会运动很快就在香港火焰重燃，并且越烧越烈。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李立峰和教授陈韬文在 2010 年的一项研究中指出，今天的香港已经称得上是社运理论所定义的“社运社会”。

2012 年，大学一年级的周永康即使是在校园，也感受到了逼迫近身的政治气旋：港大学生会遭遇政治渗透与干扰，频频被指责为“染红”，而《学苑》作为学生会媒体仅能发挥监察作用，难以扭转局面。这让周永康坐不住了，他做了好几期有关新闻自由受打压、香港人政治觉醒的专题，仍然觉得“只靠文字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靠行动，如果没有人上去改革，学生会会堕落很多年……大学都是这样，又何况整个社会？”说到这里，他开了个玩笑：“原来这个世界只有鲁迅不行，必须得有孙中山。”

2013 年，周永康竞选学生会，当选港大学生会外务副会长，并由学生会进入学联，因为在港大奋力与前任学生会抗争的成绩赢得了学联前辈和伙伴们的信任，2014 年 4 月 1 日，当选为新一届的学联秘书长。

在香港，加入大学学生会，基本等同于半个身子跨进社会运动，加入学联，则整个身子都跨了进去。几十年来，以“认识中国、关心社会”为基本理念的学联一直是香港学运与社运的急先锋，早期发动民族主义的保钓行动，1989 年六四事件之后，则与中国政府决裂，



把原本“建设民主香港”的纲领，改为“建设民主中国”，一直在中国大陆的人权危机中积极发声抗议，以示香港民主化与中国民主化的密不可分。

加入学生会和学联之后，周永康买了好多教人怎么演讲、开会、甚至推销的书，有些是实战技巧，有些是心灵鸡汤，他看得认真，细细划线。因为一向喜欢写文不喜欢说话，突然要站在台上演说，激发群众的情绪，“实在是没有经验，不会说 sound bite（容易被媒体引用的语录型句式），甚至连喊口号都不习惯”。

从中学时开始恋爱的女朋友 Kawan 也不习惯，她说自己明明爱上的是一个文学青年，一起读书谈心看电影，怎么突然有一天，男朋友就跑到舞台上，头绑白布条声嘶力竭地喊起口号了？在学联陪周永康开会的某一天，她手里一边帮忙编着抗议使用的黄丝带，一边严肃地告诉我，好几次站在周永康演讲的台下，她都悄悄跟朋友说，“这个人不是我男朋友”。

不过历史不由人选择。就在周永康正式接下学联秘书长的前两周，台湾大学生占领了立法院，太阳花学运拉开序幕，并狠狠刺激了正在民主困局中煎熬的香港。

当时正值香港 2017 普选咨询期，民间各路方案在媒体中激烈辩论，“占领中环”运动也因为行动缓慢、立场温和饱受激进派争议。3 月 23 日，学联周年大会上，当时的学联秘书长陈树晖宣布，学生不再跟随“占领中环”运动的计划，将会独立发动、提前占中，“台湾的运动证明学生可以带领社会走得更前，香港学生亦不必要等待‘占中’带领，可以随时有理据、有时机就行动！”陈树晖说。

陈树晖提出的占中时间是 7 月 1 日。“当时其实是有点尴尬的，因为一周后我就下庄了（从学联卸任），真正要带领这件事的不是我，是确定要接任的周永康”，事后陈树晖对我说：“好在 Alex 和我在这件事上看法一致，非常有共识。”

在陈树晖看来，周永康虽然并没有什么亲身参与社运的经验，但性格沉稳，“一身正气，一脸忠臣”，在大是大非上立场坚定，是可以信赖的伙伴。

就是这样，一浪接着一浪，彷彿还来不及准备，又似乎不需要什么准备，历史在最重要的时候，把这些年轻人推到了最关键的舞台上。

三、

“我要真普选，不要有筛选！”

“自己政府自己拣，自己香港自己救！”

“没有公民抗命，哪有公民提名！”



“没有理想，哪有抗争！”

带头喊了一轮口号之后，周永康走下台。我拉住他，却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是 7 月 2 日凌晨，空气里有股淡淡的咸味，分不清是维多利亚港迎面吹来的海风，还是白天的酷热游行蒸发出的汗水。许多穿着学联黑色 T 恤的年轻人在后台忙碌着，打电话、装设备、对讲稿、吃盒饭，相互调侃一些只有圈中人才听得懂的笑话。没有紧张的感觉，尽管警察就在不远处一字排开。

“你紧张吗？”停顿了很久，我问。

“昨天晚上忙到三四点睡，躺在床上开始觉得不安……我没有办法 identify（确认）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压力，只是觉得有点不安。”周永康像是在回答我，又像是用词严谨地自言自语。他看着不远处那个震耳欲聋的舞台：“你不肯定最终会有多少人在这个集会里。有记者问我说，你们行动会有多少人，警方什么时候会开始清场。我的心情真是……如果今天学生走出来，香港人留下来的不多，警方迅速清场，这就是香港社会的现实状况吗？我们是预备好了要付出代价，但我们怎么期待在下一步，更危险的时候，香港人会有多少站出来？当年轻人走出来，到底老一代人，我们的政治领袖去了哪里？”说到激动处，他哽咽起来，沉默了。

几天之后，我才知道这些话的背景。

尽管 3 月底，学联已经宣布 7 月 1 日要提前占中，但真正的行动决定，却是行动开始前一周才定下来，而且到最后，也没有得到民主派阵营中大多数前辈的支持。6 月 26 日，学联和民主派各个政党的代表、“占中三子”碰面开会，讨论 5 天后计划进行的公民抗命。这个会议上，学生们收到了许多反对和表示担忧的意见。有人觉得他们行动的理据不足：政府方案还没出台，北京也还没有一锤定音，这时候出来占中，是要反对什么呢？有人理解学生将行动升级的意愿，但担忧行动万一失控，可能给整个局面带来风险。“占领中环”运动的发起人戴耀廷与陈健民就有这样的担忧。他们刚刚发起的 622 公投赢得了超过 70 万人投票，这个数量远超他们的想像。在这个成功战胜了黑客攻击、官方媒体抹黑的全民电子投票里，79 万香港市民投票选出自己想要的普选方案——均是北京明确表示不可接受的公民提名。“已经有了一个好的成绩，最先想的就是稳住它”，陈健民 7 月 2 日之后告诉我，他们担心学生的公民抗命，万一爆发冲突，反而会减低得来不易的市民支持，也给伺机已久的打压提供藉口。

学联的学生说，这场会面不欢而散。

周永康解释，意见不一致，是因为“大家的目标不同”：“学联希望争取到公民提名权，而不只是国际标准，所以必须要透过更多的行动去达到这一点。”



如果没有真普选，我们就占领中环——这个“占中”运动的基本构想，已经成了民主派争普选的共识及“最后武器”。在这里，真普选的定义是“符合国际标准”。大多数民主派都认同，“国际标准”与基本法、乃至广义的“爱国爱港”都并没有冲突，只要北京有诚意，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的方案是完全可能的。

而年轻人并不完全赞同这一点。学联和学民思潮提出，香港的普选不仅要符合泛泛的国际标准，更要争取“公民提名”，即要求每一个公民都有直接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的权利。为了争取这一点，他们扭转了“占中”的行动模式：把谈判失败后的被动反抗，转换为一锤定音之前的主动抗争，就像他们在遮打道的夜晚喊出的口号：“没有公民抗命，哪有公民提名。”

在香港的现实政治里，公民提名是个不可能实现的选项——它的确不符合基本法中关于“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的字面规定，北京也多次明确表示不可接受。为什么明知如此，也非要坚持？

我分别去问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之锋和学联的周永康。

1996 年出生的黄之锋在 2012 年成立了香港第一个中学生社运团体学民思潮，并发起反对国民教育科的运动——反对派认为将国民教育科加入中学必修科目是洗脑工程的一部分——运动最高峰时，12 万人包围了政府总部，迫使政府撤回了决定。在反国教运动之后，学民思潮投入政改议题，并首次提出“公民直接提名特首候选人”的选项。尚未成年的黄之锋对此快人快语：你给不给是你的事，我要不要是我的事，如果普选是一场谈判，公民提名就是我们的开价，我们难道不应该遵从自己的心意开价吗？

比他大 6 岁的周永康讲到这点，沉默了好一会儿，慎重地说：“公民直接提名不仅是一个选举的制度安排，更是一个政治诉求。它把这座城市未来的决定权交还到每一个公民的手里，它象征着我们可以命运自决。”

他们两人都说，即便北京与香港民主派真的妥协达成了一个“中间方案”，学联和学民思潮这两个学生团体也会为公民提名抗争到底。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周永康说“命运自决”这四个字。此后两个多月，在不同的场合里，他越来越多地用到这个词。

在罗永生看来，这正是新世代的抗争者跟他们上一代人最不同的地方。罗永生是 30 年前的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也是在中英谈判期间，“民主回归”论述的主要推动者。（参见《摊牌（一）》）

当时关于前途命运的思考，香港民间曾有三种意见。普罗大众的主流希望“维持现状”，即英国继续管治香港，即使主权回归，治权也依然由英国保留；以学者和进步大学生为主



的知识界支持“民主回归”，以主权回归换得高度自治的民主制度；另有极少数知识份子提出“命运自决”，时任《号外》杂志主编的陈冠中就是其中代表。

罗永生说：“我们那个年代很多人是很现实地看一国两制这个东西，所谓现实就是，我们要设计一个中央接受的体系。‘中央接受’这个东西是从来都没有被怀疑过的。整整一代人都是这样。可是中央在想什么？每个人都在猜。问题就出现了。很多中间人觉得知道怎么去跟中央谈判中央可以接受，但万一判断错误，出问题了，民众就要跟你算帐，你没办法解释，因为你不是遵循理念，只是谈策略，只能站在中间成了千古罪人。新一代不一样，他们从来都没有中间人这个概念，他们是跟着理念来，自治应该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就这样去追求，没有什么前提。”罗永生说自己这代人“每一个都是务实主义者”，“因为我们不是为了一个大的理想去付出什么，而是争取活得更好而已”，而周永康、黄之锋这样新世代的抗争者，“没有旧的包袱，没有过去所有的挫折”，也许不实际，但反而“坚持了更纯粹的理想主义”。

6 月 30 日，学联仍然宣布，7 月 2 日凌晨占领遮打道。“占中三子”表示，因为时机不合适他们不会参与，也不会号召民众参与，但尊重学生的决定。

实际上他们站得并不太远。距离遮打道 400 米以外的 24 小时麦当劳，陈健民和戴耀廷在这里守了一整个晚上。他们紧盯着手机里的新闻视频直播，陈健民止不住地胃痛，戴耀廷则几次坐立难安，不断想要走出门去。

2013 年初发起占中运动时，戴耀廷曾在很多场合说，希望这个运动能有更多“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站出来”，“为下一代争取一个公平公义的制度”，而不是总让年轻人冲在第一线，人生路刚启程就要付出沉重代价。这话在当时甚至引起了不少年轻人的反感，黄之锋笑他是“家长心态”，“不尊重学生的公民身份”。说这话时戴耀廷或许很难想到，一年半之后，自己竟要面对如今这样的时刻：大学生坐在中环的马路上，以行动实践他所提出的“公民抗命”，等待被捕；而他和陈健民，同为占中发起人，同是大学老师，同是“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甚至同是 30 年前的学联成员，却只能“躲”在麦当劳，心急如焚地刷手机。

几次忍不住，戴耀廷想要走出去，和学生坐在一起，都被陈健民拦住了。“我理解他，心里太难受了”，陈健民说：“我如果是学生，现在也一定坐在那里……可是我只能跟他说，我们讲过不参与，我们必须守住自己的位置。”

戴耀廷曾经打过一个比方，如果争取真普选是一场比赛，他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既要比赛赢，又不能让对方输。意思就是，既要争取到真正的普选，又不能让中央为此感到“不放心”。所以“占领中环”不到最后一刻，必须按兵不动。这样的用心良苦，在年轻人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



“他们怕输。”在遮打道的深夜，谈起占中三子与自己这一辈学生的区别，周永康很精简地说。想了几秒后，他又补充：“毋庸置疑，是因为他们输得太多。”

“他们相信在建制里的沟通，他们相信共产党是可以商量的。”

“第二个不同是八九”，他接着说：“八九造成了两代人对占领运动想像的不同。那一年，他们确确实实是在电视上面，或者在北京的街上，见过坦克，见过军人开枪。我觉得这个图像，对他们那代人来说，始终都是很深的创伤。到了占领中环，他们会回想到天安门，会担心今天香港的占领运动，会不会面临同一个结局……”

“你们就不会有这个担心吗？”我忍不住打断他。

“他们会批评我们：你都没有经历过八九，当然不会害怕。”他好像没有听见似的，讲完这句，停顿一下，提高了声音接着说：“我会说，是，我们确实没有经历过八九，但不代表我们不明白，也不代表，因为有八九，我们就不再干。”

四周彷佛一下子安静下来，连风都停了。我低头摆正录音笔，屏住呼吸，期待着下一秒鐘就会喷涌而出的豪言壮语……

只是沉默。一阵沉默之后，毫无预兆地，对面传来了抽泣声。

我抬起头，刚刚那个冷静、理性、果敢的学生领袖好像不见了，24 岁的男生呜呜地哭起来，像个孩子一样嚼着泪水，含糊地说：“……但是根本没有希望。”

四、

“浮城从 5 月到 9 月是‘风季’，这个时期浮城里的人都做同样的梦。在梦中，人们没有翅膀却浮在半空，只是默默地、严肃地浮着。”

这是香港作家西西 1986 年写在小说《浮城志异》里的话。“浮城”，由此成了这座城市自况的经典意象。

常常可以看到中国媒体这样写香港：“1997 年，浮城找到了生根的土地。”但是 73 岁的关信基告诉我，“正是 1997，把这城市冻结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

这位精神矍烁的小个子老人，在大学里教了 38 年的政治课，桃李满门，是本地最受敬重的政治学者之一。“1997 对香港最深远的影响不是政治，是精神心态”，关信基说：“一国两制到底是权宜之计，还是千秋万世？在这个‘计’中间，香港又到底是什么角色？这是 97 问题的核心。广义的 97 问题一直存在：97 之前不确定，97 之后‘50 年不变’，反而延



续了这个不确定。人在不确定下生活，思想、行为都会变化，会得过且过，赚快钱，冒险，移民。”

关信基说，香港回归的时候，他曾经对未来做过许多预测，“很多都想到了，唯有两点没有预测到”，他说：“香港是个移民社会。移民社会不是抗争社会——抗争的人不需要离开，来香港就是要逃避，逃避的人是来找一个安乐窝，是追求安逸的。60 年代中期人口结构开始慢慢变化，旧的移民老了，本土人士生长起来。本土长大的人在政治上跟上一代人不一样，但我会假设他们受上一代熏陶，不会让他们变成激烈的人。但我没有预测到的是，政局的变化，可以让人由本来是温和的变成激进的。我也没有预测到香港的经济动力会消磨那么快，社会流动结构会变成这么窄。这些都会逼出一个不一样的新世代。2014 年，1997 出生的人 17 岁。我很肯定地说，新的世代已经出来，并且开始发挥作用。”

新的世代能让浮城扎根吗？根又扎在哪里呢？

再次见到周永康已经是 7 月 2 日傍晚，遮打道之夜 14 个小时以后，香港岛南面一个临时拘押所旁边。太阳毒辣，他和同学们刚刚获保释出来，在一个晒得冒烟的篮球场上召开记者会。

他嗓子哑了，但已经恢复冷静的表情。他对记者们说，学生在遮打道的行动只是今后一系列抗命行动的开始，“香港是我们的家，我们的下一代也要生活在这里，如果我们都不走出来，我们永远也不会有改变……我们期望为这个社会加多一点勇气。如果这勇气可以令到其他香港人站出来，这可能就是年轻人的历史角色。”

这是漫长的一天。警方凌晨 2 点半开始在遮打道清场，在几十家传媒和数百名民众的围观下，一点点拆开静坐者紧握在一起的手，平均四个人抬走一个人，用了整整 6 个小时，一直到天色大亮的早晨 8 点半，才抬走了坚持留守的 511 个人。整个过程没有爆发任何冲突，双方和平克制，引得在场的台湾社运人赞叹连连。被捕者中间，最小的 14 岁，最大的 78 岁，可以统计到的在校大学生有 82 人。巴士分批将他们运送到临时羁押中心，他们的罪名包括：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在公众地方造成阻碍及协助组织未经批准的集结——这也是不久后，真正大规模的“占领中环”发生时，抗命者会面临的罪名。晚上 9 点半之前，所有的被捕者均被释放。其中 486 人收到警告信，警方保留检控权利；25 人则取保候审，其中包括立法会议员李卓人、何俊仁和梁耀忠——曾在行动之前表达过种种忧虑的他们，还是在行动当晚来到了现场，与学生们坐在了一起。

叶咏琳和钟耀华也经历了凌晨的遮打道，秀丽清瘦的叶咏琳坐在了抗命者的队列里，钟耀华则承担了支援工作。叶咏琳告诉我：“我会觉得历史来到了，历史在我身上，我要和大家一起承担这个责任。因为前人的努力，我们享受过香港小小的自由，但我们也要为我们的下一代留下东西，不单单是因为我们是学生，而是我们是香港人。”被警察抬走前半小

时，她谈笑风生地说，已经做了很久的心理准备，而第二天，夕阳里的篮球场上再见面，她眼睛更亮："今天我知道自己准备好了。我还可以做得更多。"

钟耀华一直在警署门口等她。他热爱学术研究，却常常被女友直接了当的行动打动。几乎 30 个小时没合眼，这满脸憔悴的男生说自己全心全意为女友骄傲。

钟耀华说，自己从来没有抱希望，认为香港的这一场公民抗命可能"成功"。"但是每一代人，都要为历史的传承留下点什么。很多前人的经验、所做的事，是影响到我今天所做的事的。我们今天讲民主，大家追求民主的意识这么高涨，难道不是因为 2003 年五十万人上街吗？难道不是因为当年八九六四，北京的学生争取民主，一百多万香港人上街支援，然后支联会二十多年来坚持做纪念活动吗？我自己是 1992 年出生，都是没有经历过 89 的一代，但我自己回想，自己反抗的资源、精神、参考都是来自 1989 年的天安门。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也是在做这样的事，要为下一代留下反抗的资源。而这一次是属于香港自己的。"

在抗命的现场，周永康收到了爸爸从海外发来的英文电邮，有鼓励，更多的是担忧。爸爸跟他说，他不希望成为"占中父亲"。

"占中父亲"？我一愣。

"爸爸想到了'天安门母亲'"，周永康说。

盛夏的阳光彷彿还停留在那个篮球场上，冬天的雪花，已经倏忽而至了。

8 月 31 日的人大决议，把学生们基于理想的"占中"预演，逼向整个占领中环运动的"最后一战"。这一次，是来真的。

8 月 31 日当晚，在维多利亚港瑰丽夜空前竖起的巨大白板，上书两个嶙峋的墨字：抗命。占中运动发起人陈健民在数千人的集会中说，这是香港民主运动时代的结束，"抗命时代"的开始。在把话筒递给年轻一辈的学联与学民思潮代表时，他说感谢学生两个月前遮打道的行动，感谢他们让香港看到一场漂亮而有尊严的公民抗命，他说自己这代人曾经想站在学生前面，为他们遮挡，但现在，他们站在一起。接过话筒的周永康又哭了。他说，30 年前的香港大学生，如果知道"民主回归"的"民主"，是今天全国人大给的这么个方案，一定不可能接受，那么历史就会重新写过。而他这一代人，不愿意，也不能再重复历史的错误。

在几天后一次与台湾媒体视频连线的记者会上，周永康用流利的国语说出了几个月来在心里酝酿的话："未来香港不会再有年轻人相信'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未来不会再提'民主回归'，提出来的必定是'命运自决'，香港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要怎么走下去。"



这座在政治上从没有过“命运自决”空间的城市，怎样“命运自决”呢？周永康告诉我，他并没有想清楚，但确切地知道这一条漫长的路，自己和伙伴们，正站在起点。

他说下一次公民抗命，如果不用带头喊口号，他会带一本 Doug McAdam 的《自由之夏》去马路上看——那是讲 1964 年的美国，1000 个大学生如何在最保守黑暗的地方投入了黑人民权运动。他们付出了牺牲。但这几个月的行动改变了他们的一生，也点燃了整个六十年代的青年运动。“一场运动对参与者和旁观者的影响，当下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放在历史里来看可能就是彻底改变。我知道这场公民抗命，会深深影响我们的一生。”周永康说。

正如《自由之夏》中所说：“你感觉自己将参与这历史性一刻；在一区域中，整体生活模式里很深刻的某项东西即将要转变……你正在……创造历史。从某些方面来看是全然无私无我的，但你也同时发现了自我。”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练乙铮：香港的“占中”一代



练乙铮：香港经济和政治议题的专栏作者

“

抗议者似乎非常坚决。与他们的父母及祖父母不同，大多数抗议者都是在这个受到良好治理的城市的中產阶级家庭中长大，而且他们的成长时期被广泛认为是香港的黄金时期——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1997 年回归中国。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见识广博，强烈鄙视他们看到的内地情况：一个威权政府——腐败、野蛮、缺乏法治，被一群在很大程度上充满拙劣的、自以为是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精英控制。

”

香港——香港于五周前开始上演“占领中环”运动，这场戏剧性的开局最终以警方对手无寸铁的学生随意使用警棍、胡椒喷雾及催泪弹，促使这些参与亲民主活动的年轻抗议者获得大力支持而结尾。数百名示威者，有时是数千名，依旧占据香港的几个交通要道，在整齐多彩的帐篷中露营。

警方暴行意外地迎来新社会政治力量的惊人崛起。这个被称为“占中一代”的力量都是 80 后，他们基本上都是学生和年轻工人，其中很多人都是专业人员。他们致力于民主运动，对北京方面保持深度警惕，与包括“占中”运动的最初支持者及香港泛民主派——已知的亲民主阵营——的坚定分子在内的长辈相比，他们的地方主义色彩更浓，对内地人的文化认同度更低。

上周，当高级政府官员与抗议者就政治改革举行对话时，五名大学生及运动领袖获邀作为代表参加对话。双方的客套无法掩饰隔代人之间的对抗，会谈最终没能消除鸿沟。

官员们拒绝了学生们的要求，即独立的公民组织可以提名 2017 年香港最高官员——行政长官的候选人。官员们逐字引述了北京最近做出的规定，坚称潜在的候选人首先必须经过由 1200 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的审查，这 1200 人选自基本上支持北京的特定利益团体。学生领袖和广大公众对此都不满意。

这个僵局似乎并不容易打破：政府似乎不愿再次使用武力终结“占中”运动，而学生则不愿让步。

发言人传达了北京方面的态度，解除了之前的担忧，即人民解放军会到达现场制造第二起天安门事件。中国政府进行自我克制，原因非常明显：内地控制的公司在香港股票市值中占 60%，共产党太子党在香港拥有很多私募股权基金和高端房產。他们不愿看到香港出现大屠杀事件，这可能导致资本外流，资产市场崩溃。

抗议者似乎非常坚决。与他们的父母及祖父母不同，大多数抗议者都是在这个受到良好治理的城市的中产阶级家庭中长大，而且他们的成长时期被广泛认为是香港的黄金时期——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1997 年回归中国。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见识广博，强烈鄙视他们看到的内地情况：一个威权政府——腐败、野蛮、缺乏法治，被一群在很大程度上充满拙劣的、自以为是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精英控制。

近些年来，内地经济势力的入侵使这些年轻人进一步疏远，这种势力和其他因素一同将房价推到极高的水平，内地移民不断增加，年轻的香港人认为政府对他们的优待剥夺了当地人的教育机会、医疗保健及其他福利待遇。他们愤怒地看到，曾经满足自己日常需求的小店，变成了高端商店，服务富有的内地游客和水货客，这些人有时被叫做“蝗虫”。事实上，香港年轻人的就业和收入越依赖内地经济，他们就越痛恨北京。

而在更广泛的民主运动本身，也横亘着一条代沟。在 30 年左右的时间裡，最大的亲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一直支持以一种温和的方式与北京对抗：通过对话进行抗争，同时接受内地对香港的统治，以换取更多民主方面的承诺。鉴于北京最近在 2017 年选举问题上的强硬举措，前辈们的策略在“占中一代”眼中已经变得一无是处：它们放弃了太多，却什么也没得到。这一代人把不服从作为起点。

这扩大了泛民主派和统治阶级之间的鸿沟，也解释了这场运动的情绪再次激化的原因。令情况更糟糕的是，行政长官梁振英站在政府这一边。长期以来，许多人一直认为梁振英比一些守旧的共产主义者更加强硬和充满争议。当地商界和政府的关键人物中，几乎没人支持梁振英。实际上，在他担任行政长官的两年多里，香港社会在各个层面在政治上都进一步分化。

如果梁振英能立即满足香港人的需求和渴望，或者知道在北京如何表现得圆滑老练，他或许能找到一个解决目前僵局的办法。中国现有的一些选举法规，虽然很少得到应用，支持由公民团体和立法机构成员的提名形式。如果这些规定的实施范围延伸到香港，只需要 100 名註册选民或三名香港议员，就可以提名一位行政长官的候选人。不过，似乎没有人可以说服北京让港人使用这种做法。



目前来看，“占中”运动似乎已经进入均势。在警方和抗议者试探对方底线的过程中，被占领的地区时而扩大，时而缩小。“占中”者已经优化了轮岗制度。的士司机现在知道如何避开被阻断的道路。在受影响的区域，商店裡又有了生意。一种新的常态已经形成。

这种状况可能持续到明年春天，届时，香港政府将向议会展示政治改革法案，而议会上的亲民主派拥有足够的席位否决它。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北京已经发话，2017 年将通过 1200 人组成的特殊利益团体选举，就像 2012 年选举梁振英一样。这样的选举毫无疑问处在亲政府阵营的掌控之中，也会引发公众的更多不满。

当“占中”运动最终结束——无论是被迫还是自决——且活动领袖兑现服从逮捕的承诺时，亲民主的一代香港人将崛起：他们年轻，有活力，无所畏惧，不屈不挠。这将是北京的政治财阀及其在香港的使者难以应对的一支力量。政治领域将从此改变。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陈韬文，李立峰：占领运动新组织形态初探



陈韬文：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座教授；李立峰：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

从样本的人口特徵可以看出，占领运动参与者的主体是年轻一代，平均年龄为 27 岁，其中包括学生和更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在职青壮年。以集会高峰时期计算，参与者数以万计，而认同他们的民主诉求以至占领行动的大众则占青年人口中的大多数。简而言之，他们所代表的是香港年轻一代中的有生力量，如果政府与中央以他们作为假想敌，那么就是与整个香港未来一代为敌，这绝不是为政者所应为的。

”

占领运动一爆发，如果我们是诚实的话，大概都会惊讶于占领运动的规模和形态。我们一向关注社运与传媒的关系，觉得占领运动很可能是香港的社运的一个分水岭，值得加以探究。目前，我们所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现场问卷调查、访谈和现场观察。整个研究还在进行，这里想报告的是现场调查一些初步结果。

抗争主体是年轻的有生力量

我们在占领运动发生后首个周末，即 10 月 4 日及 5 日，进行了现场问卷调查研究。由于人手安排上的限制，我们只能在一个占领地点现场调查，选择的是金钟。抽样方面，我们指示学生助手在占领区内依指定路线行走，然后访问行走时身边经过的每第 10 位参与者。参与者自行填写问卷。两天的访问共收回 969 份完成了的问卷，回应率为 95%。

受访者中 56.9%为女性，79.4%具大专或以上的教育程度，但只有 20%是现时的大学生，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 27.7 岁，25 岁或以下的占 48.8%，26 至 40 岁的占 42.9%，41 至 60 岁占 7.4%，61 岁或以上的只有 0.8%。自认为属于“中层或中产阶级”的有 47.5%，自认为属于“下层或基层阶级”的有 48.9%，自认为属于“上层阶级”的只有 3.6%。值得留意的是，自认为属于“下层或基层阶级”的参与者比例，较过往一些大型游行集会为高。例如笔者二人在 2003 到 2007 年间做过多次七一游行现场调查，自认为属于“中层或中产阶级”的比例在 57.2%至 70.7%不等，自认为属于“下层或基层阶级”的只有 27.6 %至 41.2%



（注）。但是次调查结果却有点不一样。而且，是次调查已经是在理应较为中产的金钟占领区进行，若加上旺角，自认为属于基层的参与者比例很可能更高。

表一：不同原因對參與者參與是次佔領運動的重要性

	非常不重要或不重要	一般	重要或非常重要
爭取無篩選嘅普選	1.6	2.1	95.4
爭取公民提名	2.0	4.9	92.2
為保障香港的自由	1.4	1.7	95.7
警方向集會人士放催淚彈	4.2	8.7	85.3
支持和保護學生／同學	1.7	5.9	91.1
增加運動聲勢	7.4	22.7	69.8
體驗群眾運動	30.6	38.8	29.1
朋友的號召	43.4	37.7	17.2
家人或親戚的號召	57.5	30.2	9.5
響應同支持學聯	28.1	37.5	32.3
響應同支持學民思潮	28.5	36.4	32.9
響應同支持佔中三子	51.2	31.6	14.7
響應同支持其他有份參與的團體	49.8	32.6	13.0

註：百分比總和不足 100%，餘額為回答不知道或沒有回答的比例

表二：參與者對自發行動的看法

	非常不同意或不同意	一般	同意或非常同意
自發行動嘅重要性係令運動更加純粹	5.0	19.0	68.9
自發行動嘅重要性係防止運動被騎劫	9.0	23.9	62.2
自發行動嘅缺點係令運動失去焦點	32.9	27.1	36.8
自發行動嘅缺點係令運動失去領導	21.3	24.6	50.7

註：百分比總和不足 100%，餘額為回答不知道或沒有回答的比例

朋辈相互自发动员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大部分受访者都已经参与过多天的占领活动，其中只有 11.2%是首天参与，36.4%参与了 2 至 3 日，30.5%参与了 4 至 5 日，18.3%参与了 6 至 7 日，3.5%参与了 8 天或以上（基本上即是每天参与）。所有受访者中亦有 25.9%有试过通宵留守至少其中一个占领地点。另外，不少参与者会到不同的占领地点活动，受访者中 41.1%在之前几天有到过旺角，39.4%有到过铜锣湾。

我们在七一游行研究中已经指出，香港社会的大型游行集会，是靠香港市民自发动员的，其中一个指标，就是市民极少是跟自己所属团体或组织参与活动的。在 2003 到 2007 年的七一游行现场调查中，“与自己所属团体一起到场参与”的比例只有 1.8%至 4.7%。今次调查中指自己试过与所属团体一起参与的有 8.8%，明显地比以往高一点，但仍然是一个很低的数字。何况，占领运动持续多时，试过在其中一两天跟自己所属团体一起参与不足为奇。相比之下，大部分参与者主要是跟自己认识的人一起参与，试过跟朋友一起到场的就

高达 80%，试过跟同学或同事一起参与的分别为 41.9%和 19.5%，试过跟配偶或家人一起参与的分别有 18.4%和 18.6%。

另一个自发动员的特点，是运动参加者较少认同运动组织者或其他社会政治组织和团体的动员和号召对他们的参与决定有很大的影响。表一显示了是次调查的相关结果。当被问及参与今次占领运动的原因时，以 5 分量表来回应（1 代表非常不重要，5 代表非常重要），95.4%认为争取无筛选的普选重要或非常重要，92.2%认为争取公民提名重要或非常重要，95.7%认为为保障香港的自由重要或非常重要。当然，参与者强调运动的目标和理念是正常的情况，但值得留意的是同意增加运动声势为重要或非常重要的参与原因的受访者也有 69.8%。相比之下，认同“响应同支持学联”和“响应同支持学民思潮”为重要参与原因的受访者，只有 32.3%和 32.9%。由于现场参与者始终以年轻人为主，认同“响应同支持占中三子”为重要参与原因的受访者只有 14.7%。

自发性组织的领导与协调

当然，今次占领运动跟以往的游行集会的自发运动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其中一点是参与者的参与和表达方式可以很多元化，在占领区内，每位参与者都可以尝试做一些个人或小组的行动，以

至参与到运动的组织和协调工作之中。绝大部分参与者都有试过主动邀请他人一起参与是次运动，“试过一两次”的有 39.8%，“多次”的有 41.8%。18.3%的受访者就曾参与有关运动方向或者策略的讨论，36.3%曾参与运送物资或维持秩序。同时，参与者在网络上的行为，亦可以被视为他们参与运动的方式之一。在调查中 69.1%的受访者有通过转发运动、媒体或运动支持者的资讯和文章在新媒体平台上（互联网、社交媒体或手机群组）澄清有关运动的谣言。59.6%的受访者有试过在新媒体上回应自己认识的反占中人士的言论，24.1%的受访者有试过在新媒体上回应自己不认识的反占中人士的言论。

另外，今次运动亦出现了自发动员会否令运动失去领导甚或失控的讨论。我们在调查中亦问到受访者对自发行动的一些看法。以 5 分量表来表达，如表二显示，同意或非常同意“自发行动的重要性是令运动更加纯粹”和“自发行动的重要性是防止运动被骑劫”的有 68.9%和 62.2%。同意或非常同意“自发行动的缺点是令运动失去焦点”的只有 36.8%。不过，也有 50.7%的受访者同意或非常同意“自发行动的缺点是令运动失去领导”。

几点总结



从样本的人口特征可以看出，占领运动参与者的主体是年轻一代，平均年龄为 27 岁，其中包括学生和更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在职青壮年。以集会高峰时期计算，参与者数以万计，而认同他们的民主诉求以至占领行动的大众则占青年人口中的大多数。简而言之，他们所代表的是香港年轻一代中的有生力量，如果政府与中央以他们作为假想敌，那么就是与整个香港未来一代为敌，这绝不是为政者所应为的。

运动的参与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占领运动中有不少人是随着事态的发展而参与的。受访者中只有小部分是每天都在占领区的，不过表示第一个星期之内有参与 4 天或以上的超过半数。这个数字算是很高的，显示出参与者对运动的执着。当然，时间可以磨损斗志，运动现在已经出现疲态，但是从参与者早期的执着行为看来，他们坚持之心不可低估，在寻求解局方案时应该充分考虑在内。

动员模式方面，占领运动很大程度是自发的。即是说，因为组织动员而来的只占少数，绝大部分是因为认同争取公正的普选的目的而跟朋辈一起参与。总体上，这种自发动员模式跟七一的动员模式是相近的。不过，有些地方可能因为运动号召的团体不一，而抗争的目的和手段也不完全一样，所以自发的具体表现也有所差异。比如，现在因为学联和学民扮演较大角色的关系，运动参与者跟同学一起参加的比例就比七一游行要高许多，同时表示是为了声援而来的也有不少。

如何领导一直是自发性社会运动要面对的问题。因缘际会之下，学联、学民思潮和占中三子往往被认为是占领运动早期的领导者。不过，从调查可以看到，因为响应他们的号召而参与的比例不算高，尤其是占中三子。事实上，有三成的受访者认同学联和学民思潮的号召而来，这在香港的政治生态中已算是不错的反应。虽然如此，很明显的情况是占领运动一开始就缺乏强而有力而为各方认同的领导，有的是相对分散的多中心领导。

社会运动要有效运作，不管它是多么自发，它都要解决组织、协调、决策、执行各方面的问题。占中运动的组织形态是从运动动态中演变出来的。运动中的个人往往是就个人的认知和判断而向朋辈圈子通传、交流、号召，而这种交流又跟别的朋辈圈子重叠，互相转发，最后产生较大范围的共同认识，甚至转化为较多人一起进行的行为，达至自发运动中的协调作用。现在有三成左右的受访者承认他们有参与物资运送和维持秩序，比例算高。但是这种交流的方式是民主有余，对解决好像物资供应、人流指引等或是有效，但是对较复杂的商议和决策的作用则有待观察。

有一半的受访者就认同缺乏领导是自发运动的一个缺点。当运动变得众说纷纭而旷日持久时，运动的方向感就会减弱，如何走下去自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占领运动也要面对同样的挑战。没错，自发动员和多中心的分散领导方式有利于运动纯粹性的建立，有利于争取社会大众的信任，使人相信运动不会为利益集团所骑劫。但是，社运要有效应变，就算是标



榜自发的占领运动，也必须要制订建立共识的机制，从而制订应变策略，并有效执行。搞组织不是浪漫的事情，但似乎是社运所必须的，占领运动也不能例外。

注：这里及以下提到的七一游行研究结果，见 Francis LF Lee and Joseph M. Chan(2011). Media,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mass protests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London: Routledge, Chapter 8.

- See more at: http://www.zaobao.com.sg/wencui/politic/story20141110-410366#sthash.X1lnSGmH.dpuf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主编：方可成

编辑：胡馨以

设计：潘雯怡，季文仪

校订：童亚琦

出品人：杜婷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请发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若订阅 pdf 版请发送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mobi 版至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epub 版至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是在香港注册的非牟利团体。除了一五一十周刊之外，Co-China 每月还在香港举办论坛，并透过网络进行视频、音频和文字直播。2012 年开始 Co-China 在香港举办面向青年的夏令营，第一届主题为「知识青年，公共参与」，2013 年夏令营的主题是「始于本土：本土、国家、世界冲撞与协商」。

Co-China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co

Co-China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論壇（http://weibo.com/1510weekly）

Co-China 论坛 facebook：「我在中國」（Co-China）論壇（https://www.facebook.com/CoChinaOnline）

